

冷战后加拿大参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 选择困境与规避逻辑^{*}

李云鹏 刘胜湘

摘 要：在冷战后美国主导的中东军事行动中，加拿大作为中等强国并非一味追随，而是在参与和规避之间形成选择困境，其行为由美国发起中东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以及决策者立场一致性和国内政治约束等变量共同决定。加拿大参与海湾战争、规避伊拉克战争及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案例表明：当中东威胁迫切且行动具有合理性时，加拿大倾向参与，国内政治约束影响相对有限；当安理会决议赋予行动正当性，即便威胁不迫切，加拿大仍可能参与，但参与程度受决策者一致性和国内政治约束限制；若威胁不足且缺乏正当性，加拿大倾向规避。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加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呈现疏离态势，但在防务议题与中东事务上，加拿大仍维持对美战略依附。这凸显了西方中等强国在联盟体系中的典型行为模式，即在经济议题上进行有限调适，而在安全领域难以摆脱结构性依赖。该行为逻辑为理解西方中等强国在联盟政治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现实参考。

关 键 词：加拿大；中东；军事行动；美国；新古典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李云鹏，博士，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桂林 541004）；刘胜湘，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5-0133-2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3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23JZD030）与 202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在中东组建‘叙事联盟’的态势、影响及应对研究”（25CGJ01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概由作者负责。

军事行动是国家实现安全的一种手段。冷战结束^①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多次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域外中等强国及北约成员国,加拿大在相关行动中的选择呈现明显差异:它在海湾战争及打击“伊斯兰国”等行动中有所介入,而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则明确选择规避。^② 这表明,加拿大在美国主导的中东地区军事行动中并非简单追随,而是在参与和规避之间面临复杂的选择困境。本文旨在系统考察加拿大在面对美国中东军事行动时的决策机制,重点分析其选择困境的形成条件与规避行为的驱动机理,梳理加拿大在具体行动中的行为模式,为理解西方中等强国在联盟体系中所面临的安全依赖与经济自主之间的张力提供实证参考。

一、关于加拿大参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既有解释局限

围绕加拿大参与或规避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政策选择,学界从不同视角和层次展开探讨。既有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单一路径和综合路径展开。

单一路径聚焦于国际或国内层次某个或某几个变量的分析。德尔瓦(Louis A. Delvoie)强调伊拉克在能力和意图上不对西方构成直接威胁,是加拿大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原因。^③ 奥康纳(Brendon O'Connor)等认为,国内层次的政党和决策者立场、公众舆论和战略文化等变量造成了加拿大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结果。^④ 单一路径虽然能为加拿大参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理解提供洞见且不失简约性,但加拿大的行动立场并非只受单一层次变量的影响,这就造成单一

① 关于冷战结束的具体时间,学界对此有不同意见。本文选择以美苏首脑在马耳他(Republic of Malta)的会晤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故而将加拿大参与海湾战争的时间点划到冷战结束以后。

② 本文选取加拿大参与海湾战争、规避伊拉克战争与打击“伊斯兰国”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缘由:第一,三次军事行动均由美国主导,对加拿大而言,属于非日常事务且关乎重大国家利益。这不仅需要决策者参与决策,决策者还面临来自其他群体的压力,借此可以观察加拿大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互动,并丰富对加拿大对外政策的分析。第二,三次军事行动跨越了不同时间点,每一时间点都有相应的国际体系实力分布态势,印证了本文选取“美国发起中东军事行动”而非权力格局为自变量的适当性。第三,加拿大在三次军事行动中表现出不同立场和姿态,且加拿大和美国的决策层都经历了更迭,加拿大的国内政治和舆论环境也不同,如此可以探讨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加拿大行动立场的影响。

③ Louis A. Delvoie, “The Iraq War: Why Canada Was Right Not to Participate,” *Canadian Military Journal*, Winter 2003-2004, pp. 63-64, p. 66.

④ Brendon O'Connor and Srdjan Vucetic, “Another Mars-Venus Divide? Why Australia Said ‘Yes’ and Canada Said ‘Non’ to Involvement in the 2003 Iraq Wa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4, No. 5, 2010, pp. 526-542.

路径只能解释加拿大参与与否,而无法对加拿大的参与程度作出回答。比如,同样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加拿大哈珀政府和特鲁多政府的方式就并非一致。因此,更多研究试图结合多层次变量的综合路径进行分析。

综合路径运用多层次变量考察加拿大对外政策。海斯布鲁克(Tim Haesebrouck)等认为,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对联盟的承诺、威胁感知和政党政治影响了加拿大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军事行动的意愿,且参与符合加拿大的利益。^① 萨贝特(Farzan Sabet)将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联盟的管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执政党意识形态和选举政治选取为影响加拿大中东政策的变量,并以伊拉克战争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作为考察案例。^② 魏冰结合全球地位、地区地位和国内政治等三个层次的变量,试图获得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美国北约盟友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阵线”的通则式解释。^③

单一和综合路径研究对加拿大如何回应美国中东军事行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且对加拿大参与或规避的动因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不过,既有研究也存在不足:第一,相关研究对加拿大参与及参与程度、方式作了分离处理,即倾向于关注加拿大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方式的其中一面。然而,二者其实是加拿大对外政策决策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连贯整体。第二,运用“通则式解释”对加拿大关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立场的考察,可以大致得出加拿大参与与否的原因,但加拿大经济体量名列世界前茅,且是西方中等强国的典型代表,单独对其进行考察无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然而,关于加拿大对美国中东军事行动选择的“个案式解释”研究,则存在对加拿大参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考察不系统,且缺乏将相关因素进行整合等不足。

对此,本文拟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将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决策者立场一致性和国内政治约束等分别作为自变量、中介变

① Timer Haesebrouck, “Democratic Share in the Air Strikes Against Islamic Condition: A Qualified Comparative Review,”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4, No. 2, 2018, pp. 254–275; Thomas Juneau, “Canada’s Policy to Confront the Islamic State,” *Canadian Global Affairs Institute*, May 2015, pp. 4–5, https://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cdfai/pages/536/attachments/original/1431041975/Canadas_Policy_to_Confront_the_Islamic_State.pdf?1431041975, 上网时间:2026年6月18日。

② Farzan Sabet, “Sleeping Seside the Elephant: The United States in Canada’s Middle East Policy,” in Thomas Juneau and Bessma Momani, eds., *Middle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Canada’s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ies in a Changing Reg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2, pp. 19–24.

③ 魏冰:《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3期,第43–68页。

量和调节变量,提出更优的解释框架。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及分析框架

本部分首先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进行简要介绍,随后选取影响加拿大中东政策的不同层次变量,最后试图提出加拿大如何回应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分析框架。

(一) 解释路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实现本国利益,决策者为此不仅需要感知和承受国际体系刺激,还要回应国内群体诉求。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是塑造国家对外政策的唯一变量。^① 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似地位的国家,会因决策者个性、政治和社会制度、战略文化的区别而产生对外政策偏好和立场差异,因为多数社会结果是由非线性甚至非单调的因素相互作用所驱动的。^② 作为对体系理论局限性的回应,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试图在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之间架起桥梁,部分修正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外在约束论逻辑,并严谨地借鉴国内政治理论的核心洞见,摒弃了国家在功能上无差别的假定,^③将体系和单元层次上的变量融合到对外政策的解释当中。^④ 总体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链由三组变量组成,即发挥体系刺激作用的自变量,包含对国际体系的感知、决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单元层次的中介与调节变量,以及作为因变量的对外政策(见下图)。其中,单元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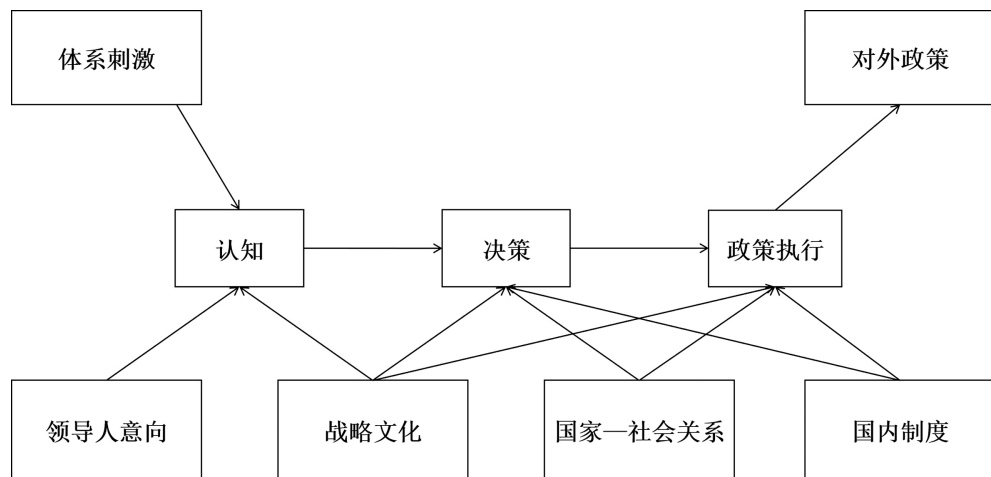
①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 915.

② Shiping Tang, "Neoclassical Realism: Methodological Critiques and Remedi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3, Autumn 2023, p. 8.

③ Kevin Narizny, "On Systemic Paradig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Critique of the Newest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2, Fall 2017, p. 183; Elias Götz,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ies, Intervening Variables, and Paradigmatic Boundar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7, No. 2, February 2021, p. 5.

④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5页;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15页;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September 2006, p. 494; Colin Dueck,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esidents,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jor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41.

的变量在系统性刺激和国家对外政策之间起着干预和调节作用。^①



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图②

资料来源：[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同属于单元层次变量，且会对国家应对体系刺激产生影响，但中介变量需要与体系层次的自变量存在直接联系，而调节变量则不需要包含这一前提，即“受体系因素直接影响的国内变量属于中介变量，跟随国内政治社会因素变动的国内变量属于调节变量”^③。

对于加拿大而言，美国主导的中东军事行动构成其对外政策决策所面临的重要外部情境。作为美国的盟友，加拿大需要考虑美国军事行动所产生的战略与联盟压力，但这种外部压力并不会直接转化为加拿大的军事参与，而是需要经过国内层面的传导与作用，最终体现为具体的对外政策选择。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加拿大在美国主导的不同中东军事行动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视角：国际体系环境构成加拿大政策选择的外部条件，国家层次变量则影响外部压力的传导及其最终的政策表现。

①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September 2006, p. 486.

② 本文在引用该图时删除了因对外政策导致的国际结果和国际结果对体系刺激的反作用图示。

③ 冯伟：《不是所有的国内变量都是中介变量——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0期，第116页。

（二）变量选择与分析框架

依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加拿大对外政策事实,本文选择将美国发起中东军事行动作为自变量,将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作为中介变量,把决策者立场一致性和国内政治约束作为调节变量,因变量则是加拿大的政策选择。

1. 自变量:美国发起中东军事行动

由于不对称相互依赖,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加拿大中东政策的背景,限制了加拿大中东政策的选择空间,甚至形成了体系层面的约束。在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上,作为中等强国的加拿大没有单独进行跨域军事打击的能力,相关军事行动是否有美国的身影成为加拿大参与与否的重要参考。比如,加拿大参与的军事行动,从朝鲜战争到海湾战争,再到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无一例外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当法国和英国公开表示考虑可能在利比亚采取空袭行动后,加拿大主张需要联合国通过授权军事行动的决议,^①暗示行动需要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对加拿大而言,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承诺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本文的自变量为美国发起中东军事行动,它从体系层次给了加拿大参与与否的刺激。^②

2. 中介变量: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除了认知到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也强调国际组织会影响国家政策选择。^③ 威胁是否具有紧迫性,军事行动是否具有合理性,取决于决策者对相关局势的认知与判断,安理会相关决议则是关乎加拿大对美国中东军事行动是否正当的规范性判断,故而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是中介变量。^④

从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角度看,当不存在清晰而紧迫的威胁时,国家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空间来回应外部刺激,政策选项广泛。而当面临清晰而紧迫的威胁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国家回应外部刺激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可供选择的政策选项相对减少。“9·11”事件发生后,加拿大主动提出援引北约第五条

① Mike Blanchfield, “Canada Rejects G8 Action on Libya No-fly Zone,” *Global News*, March 15, 2011, <https://globalnews.ca/news/111192/canada-rejects-g8-action-on-libya-no-fly-zone/>, 上网时间:2026年8月13日。

② 本文没有选择多数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视角的研究选取的国际体系权力分配为自变量,是因为实力对比变动速度较为缓慢,且同样是“单极时刻”,加拿大和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没有发生变动,但加拿大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动武的态度截然不同。

③ [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④ 本文提出美国主导的中东军事行动因威胁迫切和有联合国决议授权而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并非认同美国的政策行为,而是从加拿大视角阐明其认为该行动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

款,政府也几乎未经公开辩论就派兵参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因为该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0余名加拿大公民丧生,并危及加美边境贸易和人员流动,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相反,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加拿大强调,若要加拿大支持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需要证据证明伊拉克准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西方,^①即伊拉克确实对加拿大构成威胁,使军事行动具有合理性。

从军事行动的正当性角度看,除却自卫目的,国家在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外使用武力不具备合法性。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通过与否对加拿大参与军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加拿大强调的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的理由。^②当未面临外部紧迫威胁时,加拿大需要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以证明军事行动的正当性,稀释追随美国的风险,进而参与其中,否则会选择规避。

此外,虽然来自中东的威胁迫切与否与安理会有无相关决议,共同影响加拿大对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判断,但若存在紧迫外部威胁,使军事行动具备合理性,即便没有联合国的有效决议为行动提供正当性,加拿大也可能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比如,在安理会正式授权前,加拿大曾宣布参与针对阿富汗及“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因此,相比于联合国授权,威胁紧迫性在推动加拿大参与中东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更为显著。

3. 调节变量:决策者立场一致性和国内政治约束

将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作为中介变量有助于理解加拿大对美国中东军事行动参与与否的选择判断,但若分析加拿大参与军事行动的深度和态度差异,还要引入决策者立场一致性以及国内政治约束两个变量。

从决策者立场一致性的角度看,决策者是外部刺激和内部压力的转化者,他们在将国内资源应用于追求政策和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个体有并非一致的智识、经历和价值观,其感知、思考和行为模式存在差异。决策者职位越高,受到的限制越少,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会更容易受到个性的影响。^③因此,决策者的个性会影响其政策偏好和选择,并对本国的对外政策施加较大影响。

① “PM Wants Proof Before Backing Attack on Iraq,” *Canada’s Public Broadcaster*, September 6, 2002, <https://www.cbc.ca/news/canada/pm-wants-proof-before-backing-attack-on-iraq-1.320069>,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7日。

② “Remarks with Canadian Foreign Minister William Graham at Stakeout Following Their Meeting,”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February 14, 2002,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2002/8027.htm>,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5日。

③ 王贞:《个体分析层次:国际政治的微观解读》,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73页。

但与此同时,不管领导人有多大权威,一个人都难以单独制定或执行对外政策,因为决策团体成员可能有不同的政策主张。^① 加拿大总理不是唯一可以影响本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官员,他会受到内阁的约束,并认真考虑内阁部长的建议。^② 当决策者立场一致时,政府关于中东军事行动的制定与实施的推进就相对顺畅,反之则会难度增大。

从国内政治约束的角度看,国内政治是理解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它影响着政府调动国内资源服务于对外政策的意愿和能力。

第一,虽然议会通常不会对政府对外政策的决策构成严峻挑战,但因选举的需要,加拿大总理及其内阁官员对公众舆论特别敏感,担心议会让其难堪并受到公众的批判。^③ 与此同时,一些非正式的制度、政治惯例和程序也会影响政府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能力。比如,加拿大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内部原因就是政府遭到本党议员的反对,进而强化了政府对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的质疑。^④

第二,“国家—社会关系左右国家制定、实施政策的能力。”^⑤在执政方式上,加拿大政党具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征,其一大目的在于迎合多数选民的要求,会对民意测试和压力集团的要求做出反应。^⑥ 从国内社会角度看,参与军事行动的代价可能非常高昂,政府在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往往面临舆情障碍。决策者来自特定政治联盟,只有在满足其支持者需求的情况下,其政权才可能延续。因此,政府会根据国内政治条件来考虑如何行动。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国内政治约束越小,政府决策和施策空间就越大。

基于此,关于加拿大如何回应美国发起的中东军事行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美国发起中东军事行动后,若来自中东的威胁迫切,使行动具有合理性,加拿大将倾向于参与其中,且决策者立场一致性和国内政治约束变量对加拿大参与限度构成的限制相对较小。相反,若来自中东的威胁不迫切,且没有安理会决议为行动提供正当性依据时,加拿大将倾向于规避。不过,若安理会决议使军事行动具有正当性,即便没有来自中东的威胁,加拿大仍倾向于参与,但决策者立

① 张清敏:《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11 期,第 19、23 页。

② 储建国:《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加拿大》,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8 页。

③ 钱皓:《加拿大议会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载《国际观察》2018 年第 2 期,第 99 页。

④ 钱皓:《国际政治中的中等国家:加拿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4 页。

⑤ [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 33 页。

⑥ 任海燕:《加拿大政党及政治发展变迁:体制、选举与组织化建设》,载《比较政治学前沿》2017 年第 1 期,第 272 页。

场一致性和国内政治约束变量会对加拿大的参与限度和方式构成制约。

最后,需要对“参与”设定前提,即参与要同时包含政治支持和实战操作两个维度。因此,即便加拿大在外交声明上予以美国支持,但如若没有派遣实战式军事力量,也不能被视为参与行为。

三、加拿大参与三次中东军事行动的实证分析

加拿大参与海湾战争、规避伊拉克战争以及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①构成了美国主导中东军事行动背景下加拿大不同政策选择的典型案例。三次行动既具有美国主导这一共同背景,又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条件与决策情境之中,由此呈现出加拿大军事行动选择从参与到规避,再到参与的差异化实践。下文将依次考察三次军事行动中加拿大的决策过程、政策立场与具体行动,以揭示其军事参与和规避的选择机制。

(一) 海湾战争：加拿大的有限参与

海湾战争是加拿大在冷战结束后参与的首次海外军事行动。不同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对西方国家的中东行为构成严格约束,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为加拿大提供了针对外界刺激作出较快速军事反应的自由度。但总体而言,加拿大起初的立场较为犹疑,且在行动中的参与程度有限。

首先,尽管美国动员盟友和伙伴国,还在沙特境内部署军队,但由于美国国内及反伊(拉克)联盟就是否绕过经济制裁而使用武力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存在分歧,美国起初没有就军队集结的目的做出明确说明,立场反复且不确定,美国发起中东军事行动这一变量尚未显现。

其次,虽然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的行为不仅侵犯国家主权,还可能威胁到地区安全和石油的稳定出口,影响到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但伊拉克的行为没有对加拿大构成紧迫威胁,且联合国安理会还没有通过一份可授权成员国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足。也就是说,美国领导的反伊联盟仍具有单边主义色彩。而在非紧迫威胁环境中,国际法提供的正当

① 本文选择不考察加拿大参与利比亚战争的情况主要出于以下缘由:第一,学界对北非的利比亚是否包含在加拿大的中东语境中存在不同意见。第二,英法两国在北约行动中承担了主要作战任务,且后来美国将行动指挥权移交北约,进入“支持性角色”。第三,同海湾战争类似,加拿大未面临来自中东的紧迫威胁,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安理会关于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将其异化为对利比亚空袭的“授权”,且加拿大执政党同为亲美立场更明显的保守党。也就是说,这两次军事行动的内外背景具有较强相似性,额外的分析已无法提供新的问题和解释,本文据此将不对加拿大参与利比亚战争的情况进行考察。

性能为国家利益的辩护提供有力支撑。因此,马丁·马尔罗尼(Martin Mulroney)总理向乔治·赫伯特·布什(George Herbert Bush)总统强调,加拿大要在联合国通过决议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军事行动。^①

再次,政府内部起初关于是否派遣军队到波斯湾存在显著分歧,政府不同机构基于利益导向、组织文化及风险偏好的差异,导致政策立场一致性不强。比如,虽然马尔罗尼持联盟驱动逻辑,倾向于通过派兵展现加拿大在联盟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国防部和外交部官员也因想获得更多军费开支或维持与美国关系的考量而赞成派兵的设想,但外交部长乔·克拉克(Joe Clark)对可能的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偏向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在一开始反对派兵的计划。^②这导致决策层的犹豫,并促使马尔罗尼政府更谨慎地权衡加拿大对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参与规模与形式。

最后,议会里持反战意识形态的新民主党明确反对部署军队,自由党则对军事部署持模糊态度,直到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后才转变立场。反对党的政治合流无疑削弱了马尔罗尼政府的动员能力,迫使其限制任务范围。因此,在回答记者关于加拿大是否可能扩大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时,马尔罗尼回答道:加拿大当前的贡献是足够的。^③此时,对伊拉克动武的正当性、合理性不足,且由于决策者立场一致性差异和国内政治分歧导致决策迟滞,军队部署过程较为缓慢,并将军事姿态保持在较低程度。

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越来越显露出依靠军事手段解决这一危机的迹象。^④不仅如此,苏联逐渐接受了需要通过使用武力将伊拉克驱离科威特的可能性,给予了加拿大关于安理会可通过对伊拉克动武决议的预期。与此同时,克拉克慢慢接受了外交部官员的建议,开始支持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观点,决策者立场一致性增强。此外,当时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加拿大民众支持向波斯湾派遣船

① Fen Osler Hampson, “Book Excerpt: The Unknown Mulroney: How the Former PM Helped Shape the Mideast,” *National Post*, June 5, 2018, <https://nationalpost.com/opinion/book-excerpt-the-unknown-mulroney-how-the-former-pm-helped-shape-the-mideast>,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3 日。

② Robert Davis, *Canad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Windsor, 1997, pp. 82, 92.

③ “Remarks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Reporters in Kennebunkport, Maine, Following a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Brian Mulroney of Canada,”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ugust 27, 1990, <https://www.presidency.ucs.edu/documents/remarks-and-question-and-answer-session-with-reporters-kennebunkport-maine-following>,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7 日。

④ 据说,美国私下里要求加拿大不要提出和平计划。参见 Reg Whitaker,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Canada, the Gulf,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A Socialist Review*, Vol. 35, No. 1, Summer 1991, p. 19。

只和飞机。^① 因此,在外交声明上,加拿大态度日渐强硬。在议会质询环节,克拉克声明,如有必要,加拿大将使用武力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出。^②

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授权相关国家可对伊拉克动武的第678号决议,^③为美国领导的盟军行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同时,随着美国对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1991年1月11日,加拿大向波斯湾派遣了6架CF-18战斗机、1架加油机和130名机组人员;1月15日,马尔罗尼政府宣布派遣150名医疗人员和350名后勤人员前往波斯湾。^④

然而,国内政治对马尔罗尼政府的派兵限度形成了制约。第一,虽然民众大体支持派遣船只和飞机进入波斯湾,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又倾向于反对加拿大直接参与战争。^⑤ 也就是说,民意既最低限度地给予政府履行联盟义务的合法性基础,但同时又为军事部署的程度预设了上限。第二,尽管马尔罗尼领导的是多数党政府,不面临选举压力,但马尔罗尼本人的民意支持率不高,且当时加拿大面临财政赤字、债务高居不下和经济衰退的压力。这限制了马尔罗尼政府的冒险决策空间,促使其谨慎评估军事投入的成本与风险,以避免深度参与所伴随的高昂经济和政治代价。第三,美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缓和与两极对抗张力的弱化,推动加拿大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防务政策的调整,造成军事实力下降的结果。加拿大在此前派出的驱逐舰装备陈旧,甚至已经接近退役,且CF-18战斗机也缺乏用于空战所需的装备,难以担负深度参与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的要求。

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前,加拿大的战斗机只为在波斯湾巡航的加拿大船只提供空中保护。即便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加拿大的战斗机也只局限于在科威特边界为美国轰炸机提供掩护,直至联军控制了伊拉克和科威特领空以后,加拿大空军才执行攻击地面和水面目标的任务,且没有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参战。

① Pierre Martin and Michel Fortmann, "Canadian Public Opinion and Peacekeeping in a Turbulent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0, No. 2, Spring 1995, p. 377.

② Aaron David Smith, *Canada and the Gulf War*, Master thesi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1996, p. 120.

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78号决议》,联合国安理会,1990年11月29日,第32-33页, <https://document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574/91/pdf/nr057491.pdf>, 上网时间:2026年2月1日。

④ Robert Davis, *Canad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pp. 35-36.

⑤ Pierre Martin and Michel Fortmann, "Canadian Public Opinion and Peacekeeping in a Turbulent World," p. 377.

事实上,在美国发起中东军事行动后,若存在安理会决议为军事行动提供“正当性”依据,即便中东局势不对加拿大构成迫切威胁,加拿大也会选择参与。但是,由于中东地区事态未对加拿大核心利益构成紧迫威胁,因国内政治对政府决策和施策过程的介入,会产生不容忽视的约束力,造成加拿大从犹疑到参与,但参与程度又受限的结果。

(二) 伊拉克战争: 加拿大的谨慎规避

2003 年 3 月 17 日,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总理在议会明确宣布,加拿大不会参与美国领导的攻打伊拉克的军事行动,^①标志着加拿大首次在重要海外军事行动上同时疏离美国和英国两个最为重要的盟友。这一决定基于以下缘由:当不存在紧迫威胁赋予军事行动合理性时,对军事行动正当性的重视、强烈反对参战的民意、反对党的抵制,会限制加拿大追随美国行动的动力。与此同时,总理领导权弱化与不同政府部门立场的分歧又导致加拿大呈现模糊规避的态度。

当安理会通过谴责伊拉克不履行承诺、要求伊拉克就履行裁军义务进行合作的第 1441 号决议^②后,美国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开始加强国际社会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支持的游说工作,并派遣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前往加拿大进行协调。此时世界处于美国“唯我独尊”的单极时刻,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加拿大在经济和安全上加深了对美国的双重依赖与嵌套,美国构成加拿大安全和繁荣的核心依托,加拿大需优先考虑与美国安全战略的协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政策选择空间。因此,克雷蒂安政府不得不表示,如果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不遵守该决议,那么伊拉克将面临一系列后果,^③且以参与反恐战争为由,派遣部队到波斯湾和阿曼湾执行巡逻任务,配合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演习。

不过,加拿大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并没有推动加拿大自动加入美国主导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认为对伊拉克动武不具备合理性和正当

① “PM Says Canada Won’t Fight in Iraq,” *Canada’s Public Broadcaster*, March 19, 2003, <https://www.cbc.ca/news/canada/pm-says-canada-won-t-fight-in-iraq-1.405808>,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8 日。

②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441 号决议》,联合国安理会,2002 年 11 月 8 日,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2/682/25/PDF/N0268225.pdf?OpenElement>, 上网时间:2026 年 2 月 1 日。

③ Rick Fawn, “No Consensus with the Commonwealth, No Consensus with Itself? Canada and the Iraq War,”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397, July 2008, p. 521.

性。第一,克雷蒂安政府不认为伊拉克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也不信任美国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削弱了政府将伊拉克问题安全化,从而动员国内资源以支持战争的动力。比如,加拿大外交部长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表示,没有看到明确的证据表明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意图使用之。^①第二,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旨在确保伊拉克遵守裁军义务,难以使对伊拉克动武“正当化”。也就是说,对伊拉克军事行动因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具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参与该单边军事行动很可能会削弱加拿大的国际信誉。因此,克雷蒂安向小布什总统表示对伊拉克的动武需要合理性,并强调若能够通过安理会决议,加拿大会支持美国。^②

当未面临紧迫外部威胁时,联盟对成员国的价值将相应降低,不仅联盟成员国关于政策协调的意愿会遭到削弱,^③且国内政治对政府关于海外派兵决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执政党更倾向于考量国内政治成本,从而约束政府的政策选择。一方面,在议会结成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政党联盟”。对执政党自由党而言,规避伊拉克战争可以稳固权力、降低执政风险,所以绝大多数自由党议员不赞成对伊拉克动武。^④反对党除却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领导的加拿大联盟党外,基于积累民意资本的工具性考量,保守党、新民主党等政党基本都不赞成对伊拉克动武。这种跨党派的共识使规避伊拉克战争成为国内政治成本较低的选项。另一方面,加拿大国内民众普遍对军事干预表现出质疑和厌战情绪。其中,74%的加拿大民众反对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参与战争,只有25%的人支持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战争参与;相反,在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63%的民众支持加拿大参与对伊拉克动武,35%的民众表示反对。^⑤此外,小布什上台使美国对外政策右转,加拿大与美国围绕软木柴、小麦和钢铁的纷争加剧,加拿大人普遍不对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抱有好感。并且,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间点,与魁北克省2003年选举时间点相当接近,而后者表现出强烈反战情绪,构成不可回

① Donald Barry, “Chrétien, Bush, and the War in Iraq,” *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 Vol. 35, No. 2, 2005, p. 218.

② Jean Chrétien, *My Years as Prime Minister*, Toronto: Vintage Canada, 2008, p. 309.

③ 刘胜湘、李云鹏:《协调与疏离:欧洲对美政策探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90-91页。

④ Srdjan Vucetic, “Why Did Canada Sit out of the Iraq War? One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6, p. 143.

⑤ Graham Fraser, “War Support Hits New Low,” *EKOS Politics*, February 22, 2003, <https://www.ekospolitics.com/articles/torstar-24-02-2003b.html>,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7日。

避的钳制,克雷蒂安政府由此担心参战会对选情产生负面影响。^①一般而言,“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如果要在联邦一级的政治中充分发挥影响,就必须赢得魁北克省的议席”^②。也就是说,议会和民意的双重压力推高了政府背离前者立场可能承担的潜在政治成本,参与伊拉克战争成了政治不正确的政策选项,进一步限制了加拿大追随美国的政策空间。

更关键的是,在克雷蒂安党首地位遭弱化的情况下,其整合部门分歧的能力削弱,政府决策中妥协及采用对冲策略的特征更为明显。其中,加拿大外交部长格雷厄姆认为需要获得安理会的支持,并遵循多边主义传统,^③反映了加拿大对国际规范的重视。但是,基于维护加美联盟这一战略性资产的权力政治考量,国防部长约翰·麦卡勒姆(John McCallum)就表示即使没有联合国相关决议,也不排除加拿大参与美国主导的自愿联盟的可能性。^④对此,联邦政府没有直接否定麦卡勒姆的讲话,并采取了折中不表态的立场。因此,加拿大并没有直接否认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而是强调需要有安理会的支持,且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有伊拉克构成明确威胁。^⑤

与此同时,随着北约主要成员国关于伊拉克问题分歧的扩大,加拿大也尝试扮演中间人角色,与美国、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进行沟通,以调和美欧立场。然而,美国小布什政府并不希望给伊拉克更多时间,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安理会授权的决议,欧洲则希望通过既有的制裁措施遏制伊拉克,反对设置任何期限。

至此,加拿大意识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已无可能。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克雷蒂安以安理会没有通过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为由,宣布加

① 魁北克省的选举结果也印证了克雷蒂安政府的预想,魁北克人在随后的选举中之所以支持魁北克自由党,部分基于自由党政府没有选择向伊拉克派兵。参见 Melih Dinçer, “The Invasion of Iraq 2003 and Canadian Non-Interventionist Approach,” *Ege Stratejik Araştırmalar Dergisi*, Vol. 11, No. 2, July 2020, p. 59.

② 李剑鸣、杨令侠主编:《20 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6 页。

③ “Remarks with Canadian Foreign Minister William Graham After Their Meeting,”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January 30, 2003,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2003/17071.htm>,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4 日。

④ “Le Canada prêt à aller en guerre sans l’aval de l’ONU,” *Le Devoir*, January 10, 2003, <https://www.ledevoir.com/non-classe/17989/le-canada-pret-a-aller-en-guerre-sans-l-aval-de-l-onu>,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7 日。

⑤ Bill Graham, *The Call of the World: A Political Memoi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6, p. 274.

拿大不支持美国的战争计划。^① 不过,在决定不参与后,克雷蒂安政府没有对美国进行谴责,而且为缓解联盟压力,加拿大在随后通过向阿富汗增派部队的方式强化与美国的反恐合作,顺应了单极体系下美国主导地位的优势。

对加拿大而言,在中东局势不对加拿大构成迫切威胁时,参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不具备合理性;与此同时,未获安理会授权难以为军事行动提供“正当性”依据。在此情况下,加拿大国内政治对政府决策和施策过程具有较大的介入空间,并产生不容小觑的政治压力,严重影响政府的政治考量。此外,加拿大总理权威性不足使政府关于军事行动的立场出现不同声音。因此,即便最终不参与军事行动会对加美关系前景造成负面影响,加拿大仍然选择规避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但在此之前的立场模棱两可,即通过非对抗式的疏离规避伊拉克战争以使加美关系损失最小化,也未直接表态参与伊拉克战争以缓解议会反对党与民众的压力。

(三) 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加拿大的实质性军事介入

2014年6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由叙利亚扩张至伊拉克,并在短时间内占领和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大片区域,美国于8月7日首次对“伊斯兰国”组织展开系统性空袭行动。随着军事行动的升级,美国开始组建“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尽管两者都领导多数党政府,民意普遍将“伊斯兰国”组织视为安全威胁,议会反对党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持相似立场,且“全球联盟”行动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哈珀与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个性及其内阁的统一立场塑造了加拿大的不同参与路径。

1. 哈珀时期(2014年10月~2015年10月)

2014年9月24日,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各国支持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此后,美国向加拿大发出军事支持的呼吁。不同于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政府主导的“全球联盟”被加拿大视为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军事行动。因此,哈珀政府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的态度坚决且行动迅速,体现为通过武力遏制“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

第一,加拿大认为,“全球联盟”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通过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领土、传播极端意识形态,“伊斯兰国”组织对国际安全秩序构成威胁,并对加拿大的安全利益构成实质性挑战,其威胁范围超出中东地区。2014年9

^① Sunny Freeman, “Canada’s ‘No’ to Iraq War a Defining Moment for Prime Minister, Even 10 Years Later,” *HuffPost*, March 19, 2003, https://www.huffpost.com/archive/ca/entry/canadas-no-to-iraq-war-a-defining-moment-for-prime-minister_n_2902305,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9日。

月 22 日,“伊斯兰国”组织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ohammad al-Adnani)表示,“如果你能杀死一个不信道的美国人或欧洲人,或者一个加拿大人,那么就相信真主,且不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不要寻求任何人的裁决”^①。此后,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唆使下,渥太华连环枪击案和蒙特利尔军人遇袭事件相继发生,凸显其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对此,哈珀政府强调,“伊斯兰国”组织对加拿大构成紧迫威胁。^②此外,虽然在发动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空袭前,联合国没有通过诸如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该地区平民或维护地区稳定的决议,但伊拉克向其他国家发出正式请求,^③赋予了行动正当性。也就是说,参与美国领导的“全球联盟”,不仅回应了盟友的战略关切,且具有正当性,也是对该组织威胁的政策回应,旨在通过境外打击的方式遏制其对加拿大利益的进一步损害。

第二,国内政治对政府决策和政策实施的约束较弱。议会方面,哈珀政府能够得到稳定的政治支持。由于哈珀领导的保守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保守党党团关于加拿大参与空袭行动的立场一致,将政党政策偏好转化为国家政策立场的阻碍较小。从社会层面来看,民众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残忍和野蛮行径有共识,军事打击该组织有较强的舆论基础。根据 2014 年 10 月的一项调查,约 64% 的加拿大民众支持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空袭。^④

第三,哈珀政府决策者立场一致性较高,其政策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哈珀的个人决断。一方面,哈珀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持强硬外交和尚武立场,且对加美关系这一战略资产高度重视。^⑤哈珀上台后,加拿大出台的第一份国防战略

① Thomas Hegghammer and Petter Nesser, “Assessing the Islamic State’s Commitment to Attacking the West,”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9, No. 4, August 2015, p. 17.

② Stephanie Levitz, “Ottawa’s ISIS Motion Calls for Airstrikes, No Troops in Iraq,” *Global News*, October 4, 2014, <https://globalnews.ca/news/1596456/harpers-isis-motion-calls-for-airstrikes-no-troops-in-iraq/>,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5 日。

③ “Letter Dated 20 September 2014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Iraq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System*, 22 September 201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80053?v=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8 日。

④ Scott Fitzsimmons,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Canada’s Burden Sharing Decisions During Coalition Operations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Vol. 25, No. 6, May 2019, p. 2.

⑤ Colin Robertson, “Harper’s World View,” *Policy Options*, October 1, 2011,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the-new-normal-majority-government/harpers-world-view/>,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19 日。

就强调加拿大需要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部署军队以应对世界其他地区危机的能力。^① 另一方面,哈珀牢牢掌控了政府人事控制权,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和国防部长罗伯特·尼科尔森(Robert Nicholson)的立场与哈珀高度重合,从根源上消除了不同部门立场分歧的可能,政府决策及其实施几乎同质化。

因此,在美国发出作战邀请不久后,加拿大便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中。除部署六架 CF-18 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外,加拿大还派遣了一架加油机、两架侦察机和一架空运机,以及约 640 名军事人员执行空中加油、空中监视、侦察和护航等任务。^② 在行动期间,加拿大多数民众都对哈珀政府部署战斗机前往伊拉克进行空袭的决策表示认可,且支持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军事打击的行动。^③ 加拿大由此成为除美国外第一个将空袭行动扩展至叙利亚的西方国家。

2. 特鲁多时期(2015 年 11 月~2025 年 3 月)

在赢得 2015 年选举后,自由党党首特鲁多重申不再通过空袭方式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竞选承诺,但在其正式就任总理后,加拿大没有因此降低在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中的贡献度,且将政策重点放在扩大对伊拉克和库尔德人的训练和战斗协助、情报共享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

第一,发起“影响行动”(Operation Impact),增强反恐能力建设。特鲁多政府扩大加拿大在当地提供军事训练、咨询和援助的人员规模,将协助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进行军事技能训练、提供作战能力建设的地面特种部队成员从 69 人增加到 200 多人,^④并领导由北约成员国组成的约 500 人的训练部队。^⑤

① “Canada First Defence Strategy,”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ce*, 2008, https://publications.gc.ca/collections/collection_2010/forces/D2-261-2008-eng.pdf, p. 10.

② Kathleen J. McInnis, “Coalition Contributions to Countering the Islamic Stat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24, 2016, p. 8, <https://sgp.fas.org/crs/natsec/R44135.pdf>; Justin Massie, “Why Canada Goes to War: Explaining Combat Participation in US-led Coali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 No. 3, April 2019, p. 14.

③ “Two Thirds Agree with Iraq Mission and Goals,” *Forum Poll*, November 23, 2014, <http://poll.forumresearch.com/post/189/two-thirds-agree-with-iraq-mission-and-goals/>; “Two-thirds of Canadians Support Some Involvement in American-Led Action against ISIS,” *Angus Reid Institute*, September 25, 2014, p. 1, http://angusreid.org/wp-content/uploads/2014/12/2014.09.25_ISIS-1.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9 月 18 日。

④ [加]约翰·J.柯顿:《加拿大外交理论与实践》,陈金英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04 页。

⑤ Rahul Kalvapalle, “Canadian NATO Commander Wary of ‘Underground’ Threats Ahead of Iraq Training Mission,” *Global News*, August 29, 2018, <https://globalnews.ca/news/4417235/iraq-nato-training-mission-canadian-commander/>, 上网时间:2026 年 2 月 5 日。

第二,维持一定作战能力。特鲁多政府维持对两架 CP-140 极光空中侦察机、一架 CC-150T 型北极星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并增派两架 C-130J 运输机和四架 CH-146 战术运输直升机,^①用于执行运输装备、补给并协助联军作战的任务。

第三,协助伊拉克开展国家治理工作,加大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其一,提供资金援助。在 2018 年 7 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鲁多宣布,将提供 2,670 万美元用于改善伊拉克妇女和女童的生活水平。^② 2024 年 9 月,加拿大宣布拨款 3,830 万加元,用于支持中东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稳定项目。^③ 其二,协助伊拉克进行冲突后的过渡和稳定局势工作。加拿大承担了北约于伊拉克设立的多国非作战训练与能力建设任务在 2018 年至 2020 年间的指挥权,并派遣安全人员引导伊拉克安全机构进行组织能力建设。

由于“伊斯兰国”组织仍对加拿大构成威胁,安理会通过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决议,加拿大继续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同时具备合理性与正当性。与此同时,自由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因此即便特鲁多政府面临一定政治压力,也能够突破政策路径依赖,依据决策者个性推动政策的实施,在回应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上呈现出与哈珀政府不同的政策姿态。

第一,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加拿大提供了继续参与的动力。从合理性角度来看,虽然因“全球联盟”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实力遭到削弱,但其仍可能输出不稳定因素,并激化和煽动本土恐怖主义生成,直接挑战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比如,“伊斯兰国”组织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 (Abu Bakr al-Baghdadi) 呼吁对加拿大发动恐怖袭击,并表示加拿大恐怖袭击事件跟该组织有关。^④ 因此,特鲁多政府将“伊斯兰国”组织定义为加拿大恐怖

① Rosemary Barton, “Justin Trudeau to Pull Fighter Jets, Keep Other Military Planes in ISIS Fight,” *Canada's Public Broadcaster*, November 26, 2015,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government-position-fighter-jets-1.3338186>; Ryan Maass, “Canada Deploys CH-146 Helicopters to Iraq,” *Space War*, April 18, 2017, https://www.spacewar.com/reports/Canada_deploys_CH-146_helicopters_to_Iraq_999.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19 日。

② “Prime Minister Announces Increased Support for NATO,”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July 12, 2018, <https://www.pm.gc.ca/en/news/news-releases/2018/07/12/prime-minister-announces-increased-support-nato>, 上网时间:2025 年 11 月 4 日。

③ “Canada Supports Peace and Stability in Middle East, Africa and Central Asia,” *Government of Canada*, October 9, 2024,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national-defence/news/2024/09/canada-supports-peace-and-stability-in-middle-east-africa-and-central-asia.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11 月 2 日。

④ Rahul Kalvapalle, “ISIS Leader al-Baghdadi Appears to Call for Attacks on Canada in New Audio Recording,” *Global News*, August 22, 2018, <https://globalnews.ca/news/4403335/islamic-state-abu-bakr-al-baghdadi-recording/>,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8 日。

主义威胁的主要制造者,^①认为该组织试图通过发动叛乱袭击的方式重建“哈里发国”。^②对此,加拿大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具有合理性。从加拿大角度来看,联合国安理会于2015年11月20日通过采取一切手段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决议,^③给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提供了“正当性”依据,赋予了加拿大行动以国际法基础。在合理性与正当性结合的背景下,通过继续参与“全球联盟”的行动,加拿大既对“伊斯兰国”组织构成的威胁进行遏制,回应了美国的战略诉求,也符合自身坚持的“多边主义”外交立场传统。

第二,虽然在国内对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持整体共识的背景下,议会和舆论关于打击形式有不同意见,对政府形成政治约束,但无法对政府施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一方面,多数民众不认可特鲁多政府的立场。68%的民众希望维持加拿大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力度,强烈支持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行动。^④另一方面,撤出战斗机的倡议遭到保守党的批评,该党议员不断在议会对特鲁多政府进行责难,^⑤认为此方式的军事贡献不足。但由于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且获得新民主党支持而具有显著政治优势,特鲁多政府得以克服议会异议和民意分歧,其决策和施策的自主性、灵活性显著较强。因此,在推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议程的同时,特鲁多政府能够坚定

① “2016 Public Report on the Terrorist Threat to Canada,” *Government of Canada*, August 25, 2016, pp. 8 – 9,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scs/pblctns/2016-pblc-rpr-trrrst-thrt/2016-pblc-rpr-trrrst-thrt-en.pdf>; “2017 Public Report on the Terrorist Threat to Canada,” *Government of Canada*, December 21, 2017, pp. 5, 7,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scs/pblctns/pblc-rprt-trrrst-thrt-cnd-2017/pblc-rprt-trrrst-thrt-cnd-2017-en.pdf>; “2018 Public Report on the Terrorism Threat to Canada,” *Government of Canada*, April 29, 2019, p. 6,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scs/pblctns/pblc-rprt-trrrsm-thrt-cnd-2018/pblc-rprt-trrrsm-thrt-cnd-2018-en.pdf>, 上网时间:2026年2月18日。

② “CSIS Public Report 2022,” *Government of Canada*, March 2023, p. 25, https://www.canada.ca/content/dam/csis-scrs/documents/publications/2023/CSIS_Public_Report_2022_DIGITAL-eng.pdf, 上网时间:2026年2月18日。

③ 《第2249(2015)号决议》,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11月20日,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n15/384/12/pdf/n1538412.pdf?OpenElement>, 上网时间:2026年4月20日。

④ “Most Canadians Disagree with Trudeau’s Plan to Withdraw CF-18s, Poll Suggests,” *Canada’s Public Broadcaster*, February 6, 2016,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canada-fighter-jets-isis-poll-1.3437288>; Richard Wike and Jacob Poushter, “America’s International Image,”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8,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6/06/28/americas-international-image/>,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5日。

⑤ John Paul Tasker, “Rona Ambrose Brands Liberal Changes to ISIS Mission ‘Shameful’,” *Canada’s Public Broadcaster*, February 8, 2016,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rona-ambrose-isis-trudeau-1.3439016>,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6日。

按照自身偏好调整加拿大在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中的路径。

第三,源于自由党对国际规范和国家安全的承诺,以及特鲁多的强势领导,特鲁多政府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必要性和方式上保持高度一致,为政府政策调整的顺畅执行提供了政治基础。相比于哈珀,特鲁多立场相对温和,更为推崇危机的系统性应对和软实力的运用,重视人道主义和规范性外交。同时,通过把控任命权,特鲁多确保了政府部门立场的高度统一,政府核心成员一致支持特鲁多的应对策略,倾向于加拿大扮演非战斗性的角色,未出现类似伊拉克战争前克雷蒂安政府分歧的情况。比如,国防部长哈尔吉特·萨詹(Harjit Sajjan)认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不只有空袭一种方式,^①外交部长斯特凡·迪翁(Stéphane Dion)也表示加拿大会回绝盟友所提的部分要求。^②

从哈珀到特鲁多,“伊斯兰国”组织皆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迫切威胁,使加拿大参与美国中东军事行动具有合理性。与此同时,伊拉克的正式请求和安理会的授权,又为加拿大参与军事行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在此条件下,哈珀和特鲁多政府面临相似的国内政治态势,即同样领导多数党政府、议会和民众普遍支持加拿大对军事行动的参与,政府所受政治约束相对较小。此外,在两个政府的决策者立场都较为一致的情况下,总理政策理念偏好化为国家政策的可能性增大,促使哈珀和特鲁多两任政府都推动加拿大参与到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中,但又在政策回应上呈现差异。

四、结语

通过整合军事行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以及决策者立场一致性和国内政治约束等变量,本文提出加拿大如何回应美国中东军事行动的分析框架。加拿大关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选择,印证了该分析框架的解释力。由于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没有获得安理会的授权,行动的国际法理基础缺失,难以获得国际社会和加拿大国内的认同,显著增加了加拿大

① Nova Scotia, “Defence Minister Harjit Sajjan Stands Firm on Syria Airstrike Withdrawal Decision,” *Canada's Public Broadcaster*, November 23, 2015,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ova-scotia/defence-minister-harjit-sajjan-on-isis-air-strikes-1.3330599>,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1 日。

② Mike Blanchfield, “Canada Can't Agree to All Allied Requests in ISIS Fight: Stéphane Dion,” *Canada's Public Broadcaster*, January 28, 2016,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canada-can-t-agree-to-all-allied-requests-in-isis-fight-st%C3%A9phane-dion-1.3422605>,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4 日。

参与的潜在政治成本。此外,对加拿大而言,红海地区的事态并不构成紧迫威胁,合理性不足,难以触发加拿大在该地区投射军事实力的意愿。在此情况下,以最低限度象征性地介入,既回应了美国战略诉求,又规避了因深度卷入正当性缺失的行动而可能引发的国内政治反弹的情况,且能维护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故而,加拿大虽然在外交声明上对美国表示支持,但其实际行动却仅限于象征性地派遣三名参谋军官。^①

尽管伴随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向亚太和西半球转移,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优先级已相对下降,但确保该地区不会成为威胁美国利益和本土安全的恐怖主义温床仍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且美国同时强调将组建一个由盟友组成的责任分担网络。^② 这种责任分担转移的战略导向表明,虽然美国未来在中东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门槛正在提高,但若局势触及其战略红线而诱发动作,其对盟友进行实质性投入的要求可能增而不减。

对西方中等强国而言,其在中东的军事行动高度关联于美国的中东战略,并受制于决策者个性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其本质是国际体系压力与单元层面变量互动的复杂结果。尽管西方中等强国凭借其经济实力、规范塑造能力和外交灵活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多数西方中等强国也是美国盟友,受制于联盟困境和资源有限性,对于“被抛弃”的前景更为关切,它们需要在有限性自主图景下与美国的安全战略协调,且需分担美国维持其霸权所需的成本及风险,以巩固与美国的关系,从而换取在特定议题上的议价权。比如,尽管加拿大在经贸议题上努力实现多元化并扩大合作伙伴网络,且加美之间爆发了贸易战,^③ 马克·卡尼(Mark Carney)总理还不点名批评美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但加拿大仍

① “Canada to Participate in United States-led 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Government of Canada*, December 19, 2023,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national-defence/news/2023/12/canada-to-participate-in-united-states-led-operation-prosperity-guardian.html>; “G7 Foreign Ministers’ Declaration on Maritim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Government of Canada*, March 14, 2025,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25/03/g7-foreign-ministers-declaration-on-maritime-security-and-prosperity.html>, 上网时间:2025年12月2日。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p. 28–2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上网时间:2026年1月8日。

③ Evan Dyer, “The Art of Inflicting Pain: How to Select Targets for Canada’s Counter-tariffs,” *CBC*, August 27, 2026,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trade-war-trump-carney-tariffs-9.7321841>, 上网时间:2026年9月2日。

对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予以默许,^①在将经贸议题安全化上展现出协调姿态。^②此外,在美国发动伊朗战争后,虽然加拿大表明无意参与任何进攻性军事行动,但仍然表示支持美国采取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且当美国恢复对伊朗的空袭后,加拿大也强调这是对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的恰当回应。^③不难发现,在逆全球化趋势冲击、美国对外政策更显单边主义倾向的背景下,西方中等强国虽在经贸领域探寻多元化以降低不确定性,但在安全议题这一核心领域,它们仍将难以跟美国脱钩,政策自主性的追求由此受到制约。相关国家在经济与安全政策议题上的取向差异,既是联盟困境在当下国际格局中的映射,亦是未来关于中等强国研究的一个潜在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 远)

① “Davos 2026: Special Address by Mark Carney,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 2026,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6/01/davos-2026-special-address-by-mark-carney-prime-minister-of-canada/>. 在特朗普政府发动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行动后,卡尼政府的外交声明强调美国采取的军事行动旨在缓解威胁。参见 Mayson Maharaj, “Carney Calls for Diplomatic Resolution After U. S. Airstrikes on Iran,” *Canada’s Public Broadcaster*, June 22, 2025,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carney-calls-for-diplomatic-resolution-after-us-hits-iran-1.7568044>, 上网时间:2026 年 2 月 6 日。

② “Canada Secures 25 Deals to Boost Mineral Supply Chains,” *Mirage News*, October 31, 2025, <https://www.miragenews.com/canada-secures-25-deals-to-boost-mineral-supply-1562115/>; Colin McClelland and Blair McBride, “Government Equity in Miners Becomes U. S. Norm,” *The Northern Miner*, October 17, 2025, <https://www.northernminer.com/news/government-equity-in-miners-becomes-u-s-norm/1003883746/>,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5 日。

③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Carney and Minister Anand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February 28, 2026, <https://www.pm.gc.ca/en/news/statements/2026/02/28/statement-prime-minister-carney-and-minister-anand-situation-middle-east>; “Canada Says Was Not Consulted on Iran War and Won’t Join Offensive Action,” *NDTV*, March 18, 2026, <https://www.ndtv.com/world-news/canada-says-was-not-consulted-on-iran-war-and-wont-join-offensive-action-11230092>; Murray Brewster, “Carney Backs Latest U. S. Strikes on Iran as Trump Slams NATO Allies,” *CBC*, July 8, 2026,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iran-war-us-carney-air-strikes-9.7262373>, 上网时间:2026 年 8 月 13 日。